

鸦片战争研究的深化与新进展

——读姚薇元、萧致治等著《鸦片战争研究》

田禾

由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的《鸦片战争研究》，是鸦片战争史专家姚薇元（已故）、萧致治教授和他们现已毕业的四、五名研究生们近年来研究鸦片战争的论文结集。全书30余万字，收集了他们关于鸦片战争史的研究文章13篇。它们分开来是一篇篇很有份量的专题论文，合起来便构成了很有系统的鸦片战争史专著。全书内容显然是经过较周密的考虑，进行有计划安排的。其中包括以下几个鸦片战争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鸦片战争发生原因、性质的分析，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断，并对西方某些学者的谬说进行批驳。

（二）对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探讨，就清政府机构的腐败及道光帝的责任提出一些新看法。

（三）对鸦片战争中英双方若干主要人物的活动及其思想的评述（包括道光帝、林则徐、裕谦、龚自珍、魏源和查理义律等）。

（四）着重对鸦片战争的两部名著《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进行研究，考证前者的祖本和作者，论述后者的政治意义及其重大影响。

笔者阅读此书的过程中，颇受教益与启发，特对它进行简要的介绍。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它划分了延续二三千年的封建社会与近百余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新中国建立以来，在50至60年代中期的10余年间，鸦片战争中的若干问题，如人民的抗英斗争及其组织、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等曾引起学术界的热烈争论。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近年来，它在中国近代史各个时期、各个重大事件的研究中不能不说是一个比较冷清的角落。姚、萧等诸先生有鉴于此，特在他们执教的武汉大学历史系中设立的“中国近百年史研究室”中着重于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并拟定研究计划，招收研究生。他们在“文革”前夕即惨淡经营，“有志于撰写一部叙事周详、史论结合，全面分析鸦片战争前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领域深刻变化的鸦片战争史专著”（本书“前言”）。本书的10余篇论文即是他们在“十年动乱”前数年和“十年动乱”后数年来他们的研究成果。

这部学术专著对鸦片战争的研究不仅有其广度，而且有其深度。

首先就鸦片战争的原因、性质来说，本书不仅遵循马、恩的有关论断，进行细密的分析，而且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以充分的史实，有力地指出引起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是鸦片贸易，而“鸦片贸易的发展，纯粹是英国殖民掠夺政策的产物。”（第3页）正是由于英国侵略者在中国肆无忌惮地进行鸦片走私，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正义反抗。当时巨额的鸦片走私贩运，不仅毒害了中国千百万人的生命，掠夺了中国无数的金银财物，而且对清朝政府的统治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迫使它不得不认真考虑对策——派遣钦差大臣林则徐赴广州严禁鸦片，因而触犯了英国侵略者的利益，发动侵华战争。这便是鸦片战争的真正原因，而绝非某些西方学者所说的战争的发生原因是什么通商不自由和外交不平等，把战争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为英国侵略者辩护（第54页）。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规定了鸦片战争的性质。就英国方面来说，是“极端不义”的战争，而在中国方面来

说，是为了进行民族自卫的正义之战。



论述到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本书作者之一许增敏在其《鸦片战争与清朝吏治》中，指出“吏治的腐败，实是清朝禁烟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后，更进一步认为“考察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种种原因，最主要的仍是吏治的腐败。”（第95页）他列举吏治腐败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例如：

吏治腐败，使军备废弛，战无不败；吏治腐败，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吏治腐败，使清政府在战争中指挥谬误，行动盲目；吏治腐败，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困难；吏治腐败，加深了国内的阶级矛盾等五个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较细致的分析，认为“在鸦片战争中，无论是清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还是它的屈膝投降，从中国方面讲，都是清朝吏治腐败造成的。”（第127页）。他不同意有的人把鸦片战争的失败归结为任用非人，以为如果任用林则徐、邓廷桢等，战争即可转败为胜（第145页）。

对于作为鸦片战争中国方面举足轻重“乾纲独断”的道光皇帝，应负什么责任的问题上，杨维在其《关于鸦片战争时期道光帝的评价问题》中，认为道光帝在禁烟高潮中，能顺应历史潮流，起到组织者的作用，这是应予肯定的。当时朝臣反对禁烟或倾向于弛禁的是多数。道光帝面对着复杂的情况，能够当机立断，力排众议，支持黄爵滋的严禁论，并且敢于任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采取坚决的措施，推动禁烟运动走向高潮，这是难能可贵的，此功自不可没，说明他并非投降派，不是投降派的头子。但是，道光帝在鸦片战争中也负有重大的责任，除了当时“敌强我弱”等客观因素外，道光帝作为首要的决策人物和最高指挥官，由于他的“自大与无知”，成为战争中“速胜论”的突出代表，使得他在决策和指挥上犯了许多重大错误，而最后导致战争的失败。杨文认为“道光帝的这种错误，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错误，而是当时整个统治阶级腐朽没落的集中反映”。



对于鸦片战争中英双方主要人物的活动及其思想评价，本书有较多的文章进行了论述。

首先是对道光帝，杨维不同意解放以来完全否定道光帝的论点，认为道光帝“不是鸦片贸易的受贿者”（第152页），而是“力图振作，积极禁烟”的主战派。由于他对林则徐的重用，才有可能把禁烟运动推向高潮。他认为道光帝在战争的领导上负主要责任。如前所述，道光帝是“虚骄误国之君，不是自觉卖国之主”（215页）。

对于林则徐，姚薇元、杨卫东、李少军合写的文章中，肯定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反殖爱国的民族英雄”。他们就严禁鸦片、反殖抗英、放眼世界、爱国思想等四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林则徐在这四个方面的认识上都超过侪辈，是当时最有远见灼识的爱国政治家。同时，也指出林则徐具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有他的缺点。“他的反殖爱国思想和封建忠君思想混合在一起”（第258页）。

对于鸦片战争时期的蒙古族抵抗派官吏裕谦，丁济康在其论文中指出裕谦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抵抗派的一个重要杰出人物”（第295页）。丁文详细地论述裕谦在鸦片战争中的政绩和抵抗侵略的坚决行动后指出，他能“洞察形势，见解卓越”，提出比较切合时宜的抗英战略策略的各种表现（第303—311页），而终至“殒竭血诚，为国捐躯”的经过。他的爱国精神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获得时人的高度评价（316页）。

对于鸦片战争时期的重要先进思想家龚自珍和魏源，萧致治在其有关论文中不同意学术界有人认为龚自珍的思想“包含有一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因素”和龚自珍“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的两种不同观点，认为龚自珍是“企图挽救统治危机”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他既“没有资本主义倾向”，也“不是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第334—335页）萧致治在另一篇讨论魏源思想中着重就魏源的《海国图志》及其对中日的影响进行评论，文章阐述了《海国图志》的内容特点及其重大的深远影响，认为其“在国内产生最大影响，要数对改良维新派的启迪”。（第373页）在国外，特别是在日本，对明治维新起了启迪作用。此外，萧致治还在其《试论鸦片战争时期的改革派》一文中明确地指出当时形成的以陶澍、林则徐为政治首脑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将鸦片战争时期的改革派力量作为一个整体的全方位的考察。由于改革派官员在他们各自职位和地域内进行改革的尝试和努力，着力于整顿吏治，革除漕运积弊，锐意改革盐法，兴修水利，严禁吸食鸦片以及在学习西方长技以抵抗西方侵略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他们继承封建社会的优良传统，具有高尚的情操，重视人才，关心民生疾苦，坚持改革，并且能够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当然，这些都是从封建统治者立场出发的，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消极的一面。

（下转第22页）

生的糟粕与秕糠。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不断推进文明向前发展并克服其弊病的历史。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全球性的灾难——核战争、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粮食危机、人口爆炸等。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就需克服这些随文明而来的灾难，否则将不堪设想。

我国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给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幸福美好的前景，有效地避免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当然，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也应注意克服随文明发展而来的某些弊病，既要发展工业技术，又要保护生态平衡；既要发展科学技术，改变落后面貌，又要遏制科学主义的泛滥；既要发展科学，又要发展人学，研究人的目的、意义和价值等问题，提高人的思想境界。这，就是我们应当从伟大先哲卢梭那里得到的重要启示。

注 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0,166,76、155, 80, 80, 116、117, 79页。

⑧⑨⑩⑪⑫⑬ 《爱弥儿》，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2, 232, 506, 5, 17, 15页。

⑭⑮⑯⑰ 《论科学与艺术》，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2, 6, 4, 7页。

⑱⑲⑳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3, 125, 159页。

㉑ 《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6页。

㉒ 卢梭并不反对与盲目信仰相对立的理性，而只反对脱离感性、情感的抽象的思辨推理。当然在卢梭那里理性本身的内容也很含糊。

㉓ 同①第102页。此处哲学指沉溺于书斋、不关心现实的邪恶、奴役的思辨哲学。

㉔ 《康德全集》第20卷，德国科学院版，转引自《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李凤鸣、姚介厚著，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201页。

㉕ 应该说卢梭比他们更高明，他在很大程度上揭露了造成不幸的社会阶级根源(如私有制)，法兰克福学派却避而不谈。

㉖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5页。

(上接123页)

关于英国方面的主要人物的文章有萧致治所写的《义律其人及其侵华活动》，但也仅仅只此一篇，其他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华统帅、政府决策人物及其重要将领均付阙如，在这方面反映得很不够，这也是本书的一个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本书所论述的方面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是近年来对鸦片战争各重大方面及有关问题研究的深化的新发展。其中大多数论文论述细致，分析周到，以雄辩的史实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具有较大的说服力，特别是姚薇元教授的《道光洋艘征抚记》为魏源所作说，萧致治教授对马恩论鸦片战争两文更显得周密深刻，具有值得学习借鉴之处。正如作者在本书“前言”中说，此书力图“发前人之所未发”，“补前人之不足”，实际上确是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尽管本书的某些部分也存在着偏颇之处，如对有的人物(如裕谦)评价过高，作者对所评论的人物难免有所偏爱，因而不能公允地评价其他有关人物；某些方面强调过份，如吏治腐败作用的问题。然而就整体而论，本书是颇有特点和具有新意的。我以为此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多有提高，对有关的学术研究起了推动的积极作用，这是没有疑问的。